

“蒋介石与抗日战争(1931—1945)” 学术研讨会综述

肖如平

为了推动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史的相关研究,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于2014年6月7日至8日联合主办了“蒋介石与抗日战争(1931—1945)”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新西兰,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40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共提交论文25篇。会议围绕“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主题,分别就蒋介石与抗战战略、抗战军事、战时外交、战时内政,以及外国人眼中的蒋介石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展示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

一、蒋介石与抗战战略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力谋应变之道,逐步形成了中国的抗战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对蒋介石的抗战战略进行了概述,指出1931—1937年蒋介石的战略是守住底线,即坚决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合法性,不承认东北伪政权的合法性,坚守华北的国家主权,与日本保持一定的外交关系和交涉渠道,争取国际支持;1937—1941年的战略是苦撑待变,即始终坚持抗战,惩处叛国行为,争取国际援助,等待国际局势变化;1941—1945年是大国战略,即利用国际地位的提升,积极开展大国外交,收回国家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支持周边殖民地国家独立。他认为蒋介石的战略思维和国家战略是基本成功的。

中华军事学会傅应川对蒋介石“持久抗战”思想的形成及战略含义进行分析,指出蒋介石的“持久抗战”规划始于1933年。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蒋介石的“持久抗战”战略进一步得到发展,其含义在于以“持久消耗”破除日军的“速战速决”,在全局上“操持主动”,在军事上“坚持抵抗”,着眼于世界大局,等待国际局势变化。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郭岱君利用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的抗战战略进行分析,她指出1931—1937年蒋介石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对日容忍,并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经略西南大后方,整军备战。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又力谋打破《何梅协定》,在淞沪地区开辟第二战场,为中国抗战赢得主动。

二、蒋介石与抗战军事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开始国防规划与建设。杭州师范大学袁成毅论述了蒋介石在空军和防空建设上的作用:一是主持制定了《空军五年建设及防空计划》,为中国的空军和防空建设提供了依据;二是出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设立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为中国空军培养了大批航空人才;三是设立以蒋介石为首的航空领导机构,强化蒋介石对空军的绝对领导,推动空军建设计划的实施。

作为战时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参与了许多重大军事决策与战略部署,他的决策甚至直接影响战场胜负。浙江大学方新德对浙赣战役中蒋介石的决策进行考察,认为蒋介石对浙赣战役的作战方案经历了由决心迎战到放弃会战的转变。其原因在于日军从山东、河北、东北以及东南亚地区抽调兵力参战,中国军队已不具备与日军决战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深恐浙赣战役将招致日军报复,甚至使日军放弃北进计划,从而不利于中国抗战全局。然而,蒋介石放弃决战的决策过于仓促,导致中国军队在浙赣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

三、蒋介石与战时内政

战争既是军事的较量,更是国力的较量。动员民众支持抗战,提高行政效率就成为战时的一项迫切任务。浙江理工大学贺俊杰从社会动员的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考察,指出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是一场抗战动员运动,在增强民族团结、整合社会思想、建构国家意识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合肥工业大学陈伟对三青团团员的征收进行研究,指出蒋介石为了动员青年参加抗战,十分重视团员的吸收与发展,并制定了“质量并重”与“重质不重量”的原则。然而,三青团团员的征收过程中出现对质与量的把握失控,使团员素质良莠不齐,组织涣散,工作流于形式。湖南科技大学刘大禹指出,蒋介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在战时推动了多项行政改革,但改革效果未能如愿。其原因在于蒋介石在抗战环境中未能切实有效整顿官僚系统的作风建设与组织建设,改革措施治标不治本,再加上顶层设计不够,整体推进欠缺,使得改革的执行力大打折扣。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虽有斗争,但仍能维持合作抗日的大局。齐齐哈尔大学于耀洲提出,抗战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利用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对中共进行防范、限制和打击,甚至不断制造军事摩擦,但在中共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下,蒋介石始终不敢改变“联共抗战”的政策。

四、蒋介石与战时外交

近代以来,中、日、俄(苏)一直为东北亚地区冲突的主角,三者间的关系诡秘多变。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为了牵制日本开始寻求与苏复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军利用蒋介石日记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中苏复交进行研究,指出蒋介石在对苏复交中虽然受到“剿共”和派系之争的影响,但为了应对“满洲”问题和牵制日本,仍力主对苏复交。

对苏复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远东格局,中、日、苏之间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制衡。在全面抗战之前,联苏、联日还是中立一度成为蒋介石的艰难选择。浙江大学赵晓红对日本的二二六事件进行

研究,指出蒋介石一度判断日苏先战,从而试图改善与日本的关系。然而,由于日方态度强硬,蒋介石的联日想法落空。

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为了自身利益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曹艺指出,蒋介石曾极力阻止《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但未能成功。条约签订之后,蒋采取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继续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并加紧对美外交。蒋介石的处置与因应维护了中苏同盟关系,有利于中国的抗战大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高,蒋介石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大增。浙江大学肖如平利用蒋介石日记和英国档案资料对1942年蒋介石访问印度进行考察,指出蒋介石以调停英印关系、扶持印度民族解放视为己任,但由于他高估了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不仅未能实现访印目标,反而恶化了中英同盟关系。

开罗会议对于建构战后国际新秩序有着非凡的意义。韩国新罗大学裴京汉对开罗会议上的韩国问题进行研究,认为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对战后东亚国际新秩序的初步构想,并率先提出战后韩国应该无条件独立的主张,但由于中国刚刚恢复大国地位,对韩国问题不具有实际的影响力,最终还是同意美国“在适当时期让韩国独立”的主张。

抗战胜利前夕,中苏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政府被迫承认外蒙古独立。浙江大学尤淑君对蒋介石与1945年外蒙古独立问题进行研究,指出蒋介石在美苏压力之下,为了确保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疆的主权,换取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最终同意外蒙古独立。

五、蒋介石与战时形象建构

蒋介石非常注重个人和国家形象塑造。湖南师范大学郭辉对1936年蒋介石五十寿辰进行研究,指出蒋介石的祝寿活动,除了动员民众捐献飞机充实国防外,更重要的是把蒋介石塑造为党国的最高领袖和孙中山的指定接班人。东南大学刘云虹对蒋介石在“抗战建国纪念日”的讲话进行分析,提出“抗战建国纪念日”作为一个政治仪式,成为蒋介石向世界和全国军民传递中国抗战决心与信心的重要平台。

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抗战建国纲领》,提出抗战、建国两大任务。台湾东华大学陈进金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进行研究,提出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目的不是反共,而是尝试向世界与国人建构一个民族同源、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平等外交的现代中国形象。浙江大学张凯从王道政治的视角研究蒋介石的抗战建国方略,指出蒋介石以三民主义儒学化的方式继承孙中山王道政治理念,试图以儒学伦理挽救人心,重振民族正气,重塑民族精神,以复兴王道来建构文明国家,但最终演化为宣传口号。云南大学娄贵品对蒋介石的“国族”观进行研究,认为蒋介石为了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提出了中华民族同源论和融合论。

六、蒋介石与知识界

1932年重新复出的蒋介石十分注重延揽知识分子,并与知识界和教育界的许多重要人物有着密切联系。台湾中正纪念堂任育德对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进行研究,提出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为了扩大对美国的宣传,寻求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决定派胡适出任驻美大使。

在民族危亡之际,胡适以蒋介石“诤友”的身份出任驻美大使,为中国建立正面形象、宣传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胡适作为学者型的大使已经不能适应中美关系发展的需要,蒋介石对胡适争取美援的成效日益不满。虽然王世杰尽力从中调解,但亦不能改变胡适去职的结局。

美国森林湖学院陈时伟对1941年6月胡适在森林湖学院的演说进行分析,认为面对“孤立主义”盛行的美国,胡适的演说是运用“软实力”外交宣传中国抗战,号召美国人民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领导责任,制止战争和侵略,保卫人类共同的家园。

中山大学沈成飞对蒋介石与学生运动进行研究,指出早年的蒋介石对学生和学生运动持宽容和同情态度。然而,九一八事变后,他对学生的态度发生转变,在激烈指责中共运动学生反对政府的同时,亦对党内的“学生同情派”极表不满。

七、外国人眼中的蒋介石

加拿大女王大学邱燕凌(Emily M. Hill)运用加拿大国家档案等资料对蒋介石在加拿大人眼中的形象进行考察,认为蒋介石的形象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在1942年蒋介石被称赞为英雄和坚定的抵抗者,但到战争末期,却被认为是不称职和无能的。其原因在于,加拿大人缺乏自己的信息来源,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依赖于英美的新闻报道。而英美对蒋介石态度转变,表面上是由于《中国之命运》和1944年史迪威事件使得蒋介石不被信任,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刻板的西方观察家对中日两国经济、军事实力巨大差距的不理解。

日本对蒋介石的认知直接影响其对华政策的制定。浙江大学陈群元研究了1935—1936年日本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观察与认知,指出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后,为了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曾任用张群、吴鼎昌等具有留日背景的官员负责对日交涉。然而,日本外务省认为尽管蒋介石可能对日妥协,但蒋的这些安排不但不能说是“亲日”,反而是为了“制日”。这种观察与认知,虽使日本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但中日关系却始终无法切实改善。

总体而言,此次会议论文反映了目前学界的最新成果,一定程度扩展和深化了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除上述论文外,与会学者也在学术综合讨论中就如何推进蒋介石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作者肖如平,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